

# 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因素、心理机制及作用<sup>\*</sup>

刘取芝<sup>1</sup> 孙其昂<sup>1</sup> 施春华<sup>2</sup> 陈友庆<sup>2</sup>

(<sup>1</sup>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sup>2</sup> 河海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 南京 210098)

**摘要** 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是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信念系统。在有关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结构、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影响。未来应拓展东方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环境下的研究,探索教育、价值观、媒体接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动机的调节因素及认知机制;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参与、政治管理等行为的关系。

**关键词** 政治意识形态; 心理健康; 政治行为

**分类号** B849: C91

## 1 引言

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的心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50年代,但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断,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沉寂了将近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有关当代政治现象如美国大选的研究,以及一些心理学家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的研究使得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开始复苏。

从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角度,西方心理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末为第一阶段。Adorno, Frenkel-Brunswik, Levinson 和 Sanford (1950)对极权主义人格的研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成为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经典。受Adorno等经典研究的影响,这一阶段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人格特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以Jost等(Jost, Glaser, Kruglanski, & Sulloway, 2003a, 2003b; Jost, 2006)

提出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为标志,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推向更深的领域,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为研究重点。2008年左右至今可以归为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研究设计更加科学和深入,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过程、心理机制及神经生理机制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特别是2009~2012年间,西方心理学界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认知神经机制及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等领域为重点,推进了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发展。本文拟在有关研究成果梳理总结及评价的基础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 2 心理学视域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及结构

### 2.1 心理学视域下政治意识形态的概念

英文 ideology 一词产生于18世纪末,最初是指有关于思想的科学(science of ideas)。1846年,这一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使用。在这里,意识形态具有两重不同意义(Jost, 2006):一是相对中立的意义,指用来解释或判断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抽象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则是贬义的意义,指歪曲或违反现实的思想网络体系的表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

1950年代起西方政治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逐渐摒弃了否定性的概念而从中立的意义上研究意

收稿日期: 2013-01-08

<sup>\*</sup>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0YJA710055); 河海大学人文社科基金(2007422411)。

通讯作者: 刘取芝, E-mail: 6812930@qq.com

意识形态,即将意识形态作为个体精神世界中相对稳定的、前后连贯的信念系统加以研究。如Adorno等(1950)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意识形态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是一种思考人和社会的方式。Rokeach (1968)认为,意识形态是来源于外部权威的宗教、政治或哲学信念和态度体系,这种信念和态度体系或多或少具有制度化特点并且为一定的群体所共有。Jost (2006)进行有关文献梳理后发现,不管是心理学家还是非心理学家,其对意识形态定义本质上都是心理的,即意识形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综合来说,心理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以下含义:(1)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所共有的信念体系;(2)意识形态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成分;(3)意识形态具有组织个体的价值观和信念、驱动行为并且赋予行为以意义的作用;(4)从内容上说,意识形态包含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人生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

政治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研究的文献特指政治意识形态。Tedin (1987)将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定义为一套相互关联的、有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及其达成方式的态度和价值观系统。这一定义因其简单、概括、中立而得到西方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普遍认同(Jost, 2006; Jost et al., 2009)。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哲学信念,即社会和政治的本质以及秩序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工具信念,即如何实现和达到这样的社会和政治。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概念因其主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从主体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或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从已有文献来看,心理学界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即研究和探索特定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原因及机制。虽然有个别心理学家从精神分析和人格角度对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等进行了解释(Lothane, 2006; Twemlow, 2005),但不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和主流。其次,从个体层面出发,可以分为普通个体和领导人或政治精英两个层次。根据Jost等(2009)的理论,政治精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政治精英尤其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者的政治精英的心理

机制鲜有实证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另一方面,195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精英特别是领导人的信念系统、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s)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如O'Reilly, 2012; Renshon, 2009)。但信念系统、操作码等与意识形态虽然同属观念层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重叠和不一致之处;且在具体研究中,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普通个体层面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与展望。

## 2.2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单维结构还是多维结构。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使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即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具有两极性,左倾与右倾(美国等国家普遍使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替“左倾”、“右倾”)分别位于单一维度的正反两极(Federico, 2007; Jost et al., 2003a)。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左倾”还是“右倾”主要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1)倡导还是抵制社会变革;(2)拒绝还是接受不平等(Jost et al., 2003a, 2003b; Jost et al., 2009)。

单维的左倾-右倾意识形态结构的观点在理论建构和经验使用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被认为是200年来最简便和有效的区分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Carney, Jost, Gosling, & Potter, 2008; Jost, 2006)。但与此同时,有关研究的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常常分别受不同的潜变量的影响,且这些变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Jost et al., 2009),与二者分属单维变量两极的理论观点不相符合。许多研究者认为仅用一个维度来阐述公民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是不够的(Duckitt, 2001; Jost et al., 2009),因而提出了政治意识形态二维或多维结构理论。如Duckitt (2001)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双重过程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单维的结构,而是包含右翼极权主义(RWA)和社会优势取向(SDO)两个维度。右翼极权主义(RWA)以政治保守主义、传统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一极,以个人的自由、开放和个人主义为另外一极;社会优势取向(SDO)以经济保守主义及对不平等、权力的信仰为一极,以社会福利、社会关注及平等主义、人道主义为另

外一极。但由于 SDO 和 RWA 的得分总是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意识形态的二维 SDO-RWA 结构的观点也受到质疑(Jost et al., 2003a; Weber & Federico, 2007)。

针对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观点的冲突, 一些学者提出了调和性的观点, 即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如 Federico (2007)提出, 具有较好的政治知识和强烈的评估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者更可能遵循单维的结构, 相反具有较少的政治知识和较低的评估需要者则更有可能遵循二维或多维的结构。Jost 等(2009)提出, 对于政治活动能力和动机较强而且经常参与政治活动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政治知识较为精通者而言, 政治意识形态更有可能遵循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

### 3 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一般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建构、传播方式以及政治环境的影响等视角研究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心理学家则从另一个视角出发, 关注某一特定个体为什么受自由主义的吸引而其他个体却被保守主义所吸引等问题。近年来, 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机制和心理机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研究证据表明, 社会个体不是被动接受上层所建构和传播的意识形态, 而是在遗传、人格、环境等因素影响下的重新建构和选择(Jost et al., 2003a; Jost, 2006; Jost, Nosek, & Gosling, 2008; Jost et al., 2009)。正如 Adorno 等(1950)所说, “个体的信念系统不仅仅是匆忙忙乱地从意识形态环境中捡起的观念的集合体, 而是其人格特点的反映”。

#### 3.1 遗传及生物因素

政治意识形态的遗传学研究不断证明政治和社会事件态度受遗传因素影响, 影响范围在 20%~70%之间(Bouchard & McGue, 2003; Hatemi et al., 2010; Smith, Oxley, Hibbing, Alford, & Hibbing, 2011), 这部分地解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个体差异。如 Alford, Funk 和 Hibbing (2005)对美国 and 澳大利亚的同卵或异卵双胞胎的研究发现, 40%~50%的意识形态观念的变异可以由遗传因素来解释, 同卵双胞胎较异卵双胞胎具有更为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Bouchard 和 McGue (2003)、Bell, Schermer 和 Vernon (2009); Kandler, Bleidorn 和

Riemann (2012)关于双胞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在近几年开始兴起, 如 Amodio, Jost, Master 和 Yee (2007)用事件相关电位法对不同意识形态取向的被试的认知神经功能进行研究发现, 被试的自由主义取向越强, 其与冲突相关的扣带回活动越强, 这意味着自由主义取向强的个体对惯常反应模式的线索的敏感性更高。Oxley 等(2008)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 对突发噪音、威胁性视觉图像具有低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更有可能支持外援、自由移民、和平主义和枪支控制; 而对这些刺激表现出高敏感性生理反应的个体则更可能支持国防、死刑、爱国主义和伊拉克战争。Kanai, Feilden, Firth 和 Rees (2011)对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脑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发现 ACC (活性碳酸钙)的体积越大越趋向自由主义; 右侧扁桃体状神经丛越多则越趋向保守主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知神经基础, 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生物学基础的认识。

当然,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政治意识形态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共同影响是学界共识, 但二者孰轻孰重、关系怎样则鲜有研究。因此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遗传和环境在政治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交互作用问题。如 Settle, Dawes, Christakis 和 Fowler (2010)对个体自陈的政治意识形态状况、刺激寻求有关基因(DRD4-7R)及友谊三者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具有 DRD4-7R 基因的个体在青少年时代朋友数量越多, 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也越强; 而没有 DRD4-7R 基因的个体其朋友数量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

#### 3.2 人格因素

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的关注起源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社会科学家对法西斯和反犹太现象的解释。1950 年 Adorno 等开展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研究, 成为人格特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研究的经典。此后, 人格特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心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研究的重要问题。Carney 等(2008)在左倾-右倾单维意识形态结构和大五人格结构理论框架下对 70 余年来关于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有影响力的理论

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发现几十年的跨文化研究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对经验的开放性和尽责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最具有相关性,自由主义通常开放性较高而保守主义通常尽责性较强;外倾性、情绪稳定性和随和性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不具有显著和稳定的相关关系。为验证文献研究结果,Carney等(2008)开展了一项包含6个类别、样本容量为19884的研究,发现开放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系数为-0.25,尽责性与政治取向的相关为-0.07,随和性、外倾性和情绪稳定性与政治取向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在6类样本中,自由主义者在经验开放性上的得分的确高于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在尽责性上的得分高于自由主义者。这一研究结果也证明了Jost等(2003a, 2003b)提出的关于开放性-封闭性是左倾-右倾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心理变量的观点。

J. Block和J. H. Block(2006)开展了一项关于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时间跨度为2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童年早期即具有人格特征差异,远早于其政治取向的形成。他们发现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精力充沛、善于表达情感、合群、自我独立、复原力强和冲动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而学前期被老师描述为相对拘谨、犹豫不决、胆怯、易受伤害、刻板、过度自控的孩子,23岁时较同龄人更趋向政治保守主义。虽然这项研究因不可能控制所有无关变量而受到质疑,但许多学者认为它进一步证明了人格特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Carney et al., 2008; Jost, 2006; Jost et al., 2009)。

Sibley和Duckitt(2010)则在二维SDO-RWA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关于大五人格对社会支配取向和右翼极权主义的关系研究,发现随和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配取向有预测作用,而对经验的开放性则对右翼极权主义有预测作用,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没有预测作用。

#### 4 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

Adorno等(1950)提出:“意识形态对于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主要取决于个体的需要及其被满足的程度。”此后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格和环境变量能影响人的心理需要进而影响其政治意识形态取向(Jost, 2006)。一些心理学家开

展了大量关于意识形态需要及动机基础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 4.1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Model)

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建立在单维的左倾-右倾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起源于1950年Adorno等关于极权主义人格的经典研究。近十年来,以Jost为首的心理学家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验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模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Jost et al., 2003a; Jost, 2006; Jost, Ledgerwood, & Hardin, 2008; Jost et al., 2009; Jost & Amodio, 2012)。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需要和动机所驱动的社会认知,即人们对左倾或右倾意识形态的选择源自于一定的动机性需要。Jost等(2003a, 2003b)对12个国家44年来的研究数据进行元分析性回顾整合后得出,意识形态的动机结构由三类主要的心理变量组成:认知性动机、存在性动机和关系性动机。

认知性动机来自于对认知、评估和认知闭合的需要。换句话说,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会由于具有理解、解释和预测某些事件的需要而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如在几个国家所开展的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在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上得分高的个体更有可能持保守主义或右倾的政治意识形态(Jost et al., 2003a; Chirumbolo, Areni, & Sensales, 2004; Leone & Chirumbolo, 2008; van Hiel, Pandelaere, & Duriez, 2004)。Jost等(2003a, 2009)总结研究发现,具有较强的对确定性、秩序、结构和闭合性的需要者更可能持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存在性动机来自于应对死亡焦虑、威胁及厌恶情绪的需要。一些关于恐怖事件心理反应的研究证明,当环境不安全感增强时,人们更趋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如Bonanno和Jost(2006)在9·11事件发生18个月后将9·11恐怖袭击事件幸存者的研究发现,38%的被调查者报告变得更加保守;Willer(2004)的一项时间序列研究发现,在2001-2004年间,每当政府提高恐怖主义警戒水平时,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就会上升;Echebarria-Echabe和Fernández-Guede(2006)研究显示,2004年3月11日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的后果之一是,与袭击事件之前的基线相比,调查参与者在极权

主义测量中得分更高, 更有可能支持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Jost 等(2003a)文献回顾发现, 对死亡的恐惧、系统性威胁和对危险的觉知与保守主义信念呈正相关。

关系性动机则源自归属和社会认同的需要。Cohen (2003)实验研究发现, 实验参与者会由于自己的政党支持某项政策而支持某项政策, 不管政策的内容合理与否; 而且为了与群体内成员保持一致, 会根据自己所在政党的立场而参与精心策划并且有失偏颇的政策信息加工过程。Jost 等(2008)在理论整合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指出, 关系性动机会使得人们选择某一确定的人际关系或群体所持有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Poteat, Mereish, Liu 和 Nam (2011)研究发现, 同辈友谊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 政治意识形态能预测个体间建立友谊的可能性, 且预测效应强于个体对同性恋态度的相似性。

#### 4.2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 (Dual-Process Motivational Model)

双重过程动机理论建立在二维的 RWA-SDO 意识形态结构基础之上, 其核心观点是意识形态的两个维度 SDO 和 RWA 具有不同的动机基础, 社会优势取向(SDO)起源于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需要, 右翼极权主义(RWA)则起源于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Duckitt, 2001; Duckitt & Sibley, 2009, 2010)。具体来说, 权力动机、强硬和缺乏同情心的人格特质会使得人们将社会性世界知觉为一个充满竞争的、凶狠的世界, 进而强化人们对权力、支配、优势的动机性追求, 形成社会优势取向(SDO)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 服从的人格特质则使人们将世界知觉为充满危险的存在, 激发人们的社会控制和安全的动机性需要, 形成右翼极权主义(RWA)的政治意识形态体系。Duckitt, Wagner, du Plessis 和 Birum (2002)及 Sibley 和 Duckitt (2009, 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 RWA 和 SDO 具有不同的人格基础, 与双重过程动机理论观点一致。

概括而言, 上述动机性社会认知理论和双重过程动机理论本质上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在人格、生物、情境等因素影响下的动机驱动性社会认知, 所不同的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观点和具体动机结构内容。

## 5 政治意识形态对个体政治行为、心理健康的作用

### 5.1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中, 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激发和鼓动人类政治行为的作用。但随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出现, 一些政治学家认为, 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激发集体行动的能力, 政治行为不再由思想的热情而是由实用主义需要所决定。而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关于政治现象的研究仍然不断证明, 政治意识形态对政治行为如选举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如, Jost (2006)对 1972~2004 年间美国的总统选举行为研究发现, 政治思想取向对选举行为有强烈的影响: 80%的自认为“自由主义”或“极端自由主义”的被试选择民主党候选人; 80%自认为“保守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的被试选择共和党候选人。在对政治现实和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Jost (2006)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激发政治行为的作用, 即个体根据其政治意识形态而采取行动。当然, 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 Glassman 和 Karno (2007)认为, 将政治意识形态界定为人类行为的辅助性因素的观点也许更为合适。

### 5.2 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

政治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二战后的 20 年间曾被大量讨论并纳入实验研究的范畴。近年来恐怖事件的频繁和升级, 使得关于意识形态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社会情境, 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概括来说, 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 3 种主要观点:

(1)政治意识形态能为处于危险中的人们提供价值观、意义和行为指引, 从而增强人们在压力情境下有效应对的能力, 对创伤后人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保护性作用(Brune et al., 2002; Kanagaratnam, Raundalen, & Asbjørnsen, 2005)。Laufer, Solomon 和 Levine (2010)对有过恐怖事件经历的以色列年轻人调查研究发现, 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与创伤后的成长呈正相关; 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暴露水平及创伤后的心理成长具有调节效应; 政治意识形态还具有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政治和宗教信念对逆境下的健康具有积极的效应的观点, 强调政治和宗教信念对成长的作用以克服创伤的影响。

(2)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意识形态可能不是起到缓解和保护作用,而是起相反的作用。Laufer和Solomon(2010)对2999名7~10年级经历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学生的调查发现,持右翼思想的年轻人抑郁症状轻于持左翼思想者;但是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意识形态倾向越强,心理症状水平越高。Oren和Possick(2010)对326名被以色列政府驱逐出加沙地区的犹太人的研究发现,强制驱逐者较自愿撤离者有着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PTSD症状水平。

(3)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不一样的影响。一些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如自由主义者。如Bonanno和Jost(2006)对9·11幸存者的研究发现,政治保守主义者、右翼极权主义者及保守主义转向者普遍出现PTSD和抑郁水平缓慢增高。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2005~2007年间,61%的共和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但只有47%的民主党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Carroll, 2007)。Subramanian, Huijts和Perkins(2009)通过对来自29个欧洲国家的个人水平数据的研究也发现,持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者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持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者。Napier和Jost(2008)研究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幸福感鸿沟”不仅仅有人口学因素(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的影响,还存在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一是自由主义可能由于喜欢反思和内省而容易不满现状;二是保守主义由于认可比较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现状合理化的理由,因此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具有缓冲剂的作用。Schlenker, Chambers和Le(2012)进一步发现保守主义具有更强的个体自理性(personal agency)、更乐观的心态、更超然的道德信仰和更广泛的公平信念,他们认为这些差异更好地解释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幸福鸿沟”。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与被试所处的社会环境背景有关。在正常社会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认可现状而对一般的压力具有缓冲和保护的作用,从而健康水平普遍较高;但在极端压力情境下,保守主义者由于不善于变通、对不确定性的耐受性较差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差的健康水平。

## 6 评价与展望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对它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对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的复苏,为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变化提供了依据,为社会政治精英建构意识形态提供了参考,也为更加深入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启发和方向。但总体来说西方国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研究方法局限。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机制的研究多数为相关研究而非因果关系研究,因而不能说明心理因素和意识形态孰因孰果,虽然相关的理论整合已进行了一定的看似合理的解释,但仍需要开展因果关系研究加以验证(Jost et al., 2003a; Duckitt & Sibley, 2009)。另一方面,鉴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具有足够时间跨度的纵向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如Verhulst, Eaves和Hatemi(2012)在对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基础上得出,未来如果能采用多维方法开展专门小组研究,探索人格和政治意识形态从童年期至成人期的发展轨迹,对研究人格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关系将会是无价的。

二是研究样本集中于西方文化背景,缺乏东方及社会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如Jost等(2003a)所进行的关于保守主义的文献研究跨越了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南非等12个国家,但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Freedman(2010)在对Jost等的著作《意识形态及系统公正化的社会和心理基础(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评论中指出,除了少数研究外,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人类行为的著作。

中国目前还几乎没有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的本土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如何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政治文化环境,拓展本土化研究,对相关理论建构和解决政治教育、社会思潮引领等现实问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笔者认为,本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心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1)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

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和作用等研究的基础。目前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大部分在单维的左倾-右倾结构基础之上开展, 但如前文所述, 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观点, 有待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受中庸、和谐、大同等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 需要深入探索和研究西方左右对立的二元区分是否具有适应性。因此, 未来本土化的研究需要从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出发, 从理论建构和经验探索两条路径研究中国个体政治意识形态维度结构特点。

(2) 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思想教育引导的科学依据。西方国家关于遗传、环境、人格、需要等因素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效果的研究以单变量研究为主, 多数是就某一个因素如人格、情境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展研究, 且对情境因素的探索比较单一, 可见的成果主要以对 9·11 等恐怖事件的影响研究为主。有必要开展多因素多变量研究, 将人格因素与情境因素、生物因素结合起来, 探索其交互效应; 同时对媒体接触、教育、政治知识、价值观、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以研究, 建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模型。

(3) 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研究。就政治意识形态的心理机制而言, Jost 等提出的认知性动机和存在性动机都以个体性需要为出发点, 即使是关系性动机,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体归属和认同需要的表现。因此, 西方意识形态心理机制研究具有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色彩。在社会主义文化环境下, 是否存在上述 3 种动机以外的其他动机? 什么情境下, 个体会超越上述 3 种动机而选择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在心理动机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 有无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这些问题的加以探索。

(4) 深化政治意识形态与行为关系研究。西方关于政治意识形态与行为关系的研究集中于政治意识形态取向与选举行为的研究, 研究范围狭窄, 且与西方政党政治的文化背景有关。事实上, 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许具有复杂性,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为之间同样可能存在复杂多变的中介和调节

变量。本土化研究既要探索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意识形态与选举行为以外的政治参与、政治管理等行为之间的关系, 更要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政治行为的机制及其中介变量、调节变量等问题进行理论与经验实证分析。

## 参考文献

- Adorno, T. W., Frenkel-Brunswick, E., Levinson, D. J., & Sanford, R. N.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Oxford, England: Harpers, xxxiii, 990.
- Alford, J. R., Funk, C. L., & Hibbing, J. R. (2005). Ar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153-167.
- Amodio, D. M., Jost, J. T., Master, S. L., & Yee, C. M. (2007). Neurocognitive correlates of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Nature Neuroscience*, 10, 1246-1247.
- Bell, E., Schermer, J. A., & Vernon, P. A. (2009).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 analysis using twin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855-879.
- Block, J., & Block, J. H. (2006). Nursery school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two decades later.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0, 734-749.
- Bonanno, G. A., & Jost, J. T. (2006). Conservative shift among high-exposure survivors of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8, 311-323.
- Bouchard, T. J., Jr., & McGue, M. (2003).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human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Neurobiology*, 54, 4-45.
- Brune, M., Haasen, C., Krausz, M., Yagdiran, O., Bustos, E., & Eisenman, D. (2002). Belief systems as coping factors for traumatized refugees: A pilot study. *European Psychiatry*, 17, 451-458.
- Carney, D. R., Jost, J. T., Gosling, S. D., & Potter, J. (2008). The secret lives of liberals and conservatives: Personality profiles, interaction styles, and the things they leave behind. *Political Psychology*, 29, 807-840.
- Carroll, J. (2007). Most Americans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personal lives. Gallupreport. <http://www.gallup.com/poll/103483/most-americans-very-satisfied-their-personal-lives.aspx>
- Chirumbolo, A., Areni, A., & Sensales, G. (2004).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politics: Voting,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attributional sty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 245-353.
- Cohen, G. L. (2003). Party over policy: The dominating impact of group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808-822.

- Duckitt, J. (2001). A dual process cognitive-motivational theory of ideology and prejudice.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33, pp. 41–113).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 Duckitt, J., & Sibley, C. G. (2009). A dual-process motivational model of ideology, politics, and prejudi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 98–109.
- Duckitt, J., & Sibley, C. G. (2010). Personality, ideology, prejudice, and politics: A dual-process motivational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 1861–1892.
- Duckitt, J., Wagner, C., du Plessis, I., & Birum, I. (2002). The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prejudice: Testing a dual-process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75–93.
- Echebarria-Echabe, A., & Fernández-Guede, E. (2006). Effects of terrorism on attitudes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259–265.
- Federico, C. M. (2007). Expertise, evaluative motiv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citizens' ideological commitm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28, 535–561.
- Freedman, M. (2010).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ases of ideology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Edited by John T. Jost, Aaron C. Kay, and Hulda Thorisdottir. *Political Psychology*, 31(3), 479–482.
- Glassman, M., & Karno, D. (2007). Ideology as instru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 1075–1076.
- Hatemi, P. K., Hibbing, J. R., Medland, S. E., Keller, M. C., Alford, J. R., Smith, K. B., ... Eaves, L. J. (2010). Not by twins alone: Using the extended family design to investigate genetic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798–814.
- Jost, J. T. (2006). The end of the end of ide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61, 651–670.
- Jost, J. T., & Amodio, D. M. (2012). Political ideology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neuroscientific evidenc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6, 55–64.
- Jost, J. T., Federico, C. M., & Napier, J. L. (2009).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 307–337.
- Jost, J. T., Glaser, J., Kruglanski, A. W., & Sulloway, F. J. (2003a).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339–375.
- Jost, J. T., Glaser, J., Kruglanski, A. W., & Sulloway, F. J. (2003b). Exceptions that prove the rule: Using a theory of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to account for ideological incongruities and political anomalies: Reply to Greenberg and Jonas (2003).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 383–393.
- Jost, J. T., Ledgerwood, A., & Hardin, C. D. (2008). Shared reality,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basis of ideological belief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1), 171–186.
- Jost, J. T., Nosek, B. A., & Gosling, S. D. (2008). Ideology: Its resurgence in social,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 126–136.
- Kanagaratnam, P., Raundalen, M., & Asbjørnsen, A.E. (2005). Ideological commitment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in former Tamil child soldier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6, 511–520.
- Kanai, R., Feilden, T., Firth, C., & Rees, G. (2011).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re correlated with brain structure in young adults. *Current Biology*, 21, 677–680.
- Kandler, C., Bleidorn, W., & Riemann, R. (2012). Left or right? Sources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 roles of genetic factors, cultural transmission, assortative mating,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633–645.
- Laufer, A., & Solomon, Z. (2010).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following terror. *Youth & Society*, 41, 414–433.
- Laufer, A., Solomon, Z., & Levine, S. Z. (2010). Elaboration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youth exposed to terror: The role of religios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5, 647–653.
- Leone, L., & Chirumbolo, A. (2008).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avoidance of affect: Need for affect scales predict conservatism measur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2, 755–762.
- Lothane, Z. (2006). Mass psychology of the led and the leaders. *International Forum of Psychoanalysis*, 15, 183–192.
- Napier, J. L., & Jost, J. T. (2008). Why are conservatives happier than liberal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565–572.
- Oren, L., & Possick, C. (2010). Is ideology a risk factor for PTSD symptom severity among Israeli political evacuee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3, 483–490.
- Oxley, D. R., Smith, K. B., Alford, J. R., Hibbing, M. V., Miller, J. L., Scalora, M., ... Hibbing, J. R. (2008). Political attitudes vary with physiological traits. *Science*, 321, 1667–1670.
- O'Reilly, K. P. (2012). Leaders' perceptions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 political psychology approach to prolifer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3, 767–789.
- Potat, V. P., Mereish, E. H., Liu, M. L., & Nam, J. S. (2011). Can friendships be bipartisan?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ideology on peer relationship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 819–834.
- Rokeach, M. (1968). 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San



- Francisco: Jossey-Bass.
- Renshon, J. (2009). When public statements reveal private beliefs: Assessing operational codes at a distance. *Political Psychology*, 30, 649–661.
- Schlenker, B. R., Chambers, J. R., & Le, B. M. (2012). Conservatives are happier than liberals, but why? Political ideology, personal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6(2), 127–146.
- Settle, J. E., Dawes, C. T., Christakis, N. A., & Fowler, J. H. (2010). Friendships moderate an association between a dopamine gene variant and political ideolog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2, 1189–1198.
- Sibley, C. G., & Duckitt, J. (2009). Big-five personality, social worldviews, and ideological attitudes: Further tests of a dual process cognitive-motivational model.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9, 545–561.
- Sibley, C. G., & Duckitt, J. (2010). The personality bases of ideology: A on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0, 540–559.
- Smith, K. B., Oxley, D. R., Hibbing, M. V., Alford, J. R., & Hibbing, J. R. (2011). Linking genetics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Re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ide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32, 369–397.
- Subramanian, S. V., Huijts, T., & Perkins, J. M. (2009). Association betwee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health in Europ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 455–457.
- Tedin, K. L. (1987).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vote.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2, 63–94.
- Twemlow, S. W. (2005). The relevance of psychoanalysi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erroris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6, 957–962.
- van Hiel, A., Pandelaere, M., & Duriez, B. (2004). The impact of need for closure on conservative beliefs and racism: Differential mediation by authoritarian submission and authoritarian domin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824–837.
- Verhulst, B., Eaves, L. J., & Hatemi, P. K. (2012). Correlation not caus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1), 34–51.
- Weber, C. W., & Federico, C. M. (2007).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 and patterns of ideological belief. *Political Psychology*, 2, 389–416.
- Willer, R. (2004).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issued terror warnings on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ings.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al Psychology*, 10(1), 1–12.

## Political Ideology: Correlate Factors, Psychological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LIU Quzhi<sup>1</sup>; SUN Qi-ang<sup>1</sup>; SHI Chunhua<sup>2</sup>; CHEN Youqing<sup>2</sup>

(<sup>1</sup> Marxism College of Hohai University; <sup>2</sup> 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ideology is a psychological concept by its very nature. It can therefore be defined as an interrelated set of attitudes and values about the proper order of society and how this order can be achieved. In this review, we examined recent theoretical and research studies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ideology,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an individual'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al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Parallel investigations in eastern or socialist cultural contexts will need to be conducted in the future. These research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values and the type and frequency of access to news media on political ideology. Additional areas of focus for future research include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that affect these political views, and the cognitive process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such thoughts. Similarly,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al ideology wi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ideology; mental health; political behavior